

文化

红色领袖列宁 布哈林 斯大林—— 对“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理解与阐释

张建华

【内容提要】苏维埃文化建设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红色领袖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均以极大精力关注苏联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但三者的思想认识和政策结果不尽相同。

【关键词】列宁 布哈林 斯大林 文化革命 苏维埃文化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1）01-0052-12

苏维埃文化（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Soviet Culture）是苏联时代基本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这种文化起源于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之中，随即成为苏联的主流文化，在苏联社会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在它存在的七十余年中，自身包括了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在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代，它的象征符号是“红色政权”、“红军”、“红陆军”、“红海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列宁”；在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高涨时代，它的象征符号是“斯达汉诺夫运动”，“整乡、整村、整个专区加入集体农庄”；在卫国战争时期它的象征符号是“爱国主义”、“俄罗斯性格”、“潘菲洛夫战士”、“为了斯大林！”；在 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苏维埃文化仍然雄居绝对支配地位，它的象征符号更为丰富，不仅反映在精神层面，如苏联公民的公共优秀品德、社会主义理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族际主义等，而且更多地反映在物质层面，如苏联公民的日常生活、以核武器为代表的

苏联军事实力、苏联在空间技术的领先水平等。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红色领袖们以极大精力关注苏联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根本原因是他们清楚地体察到了今天被国际学术界共识为“软实力”（Soft Power）的“文化建设”在政权建设和国家体制中的重要位置。但列宁、斯大林与布哈林在上述问题上的思想认识和实施的政策结果不尽相同，本文拟作简要概述和比较研究。

一、列宁的“文化革命” 思想与规划

列宁的“文化革命”概念实际上包含了“意识形态革命”、“文明继承”和“知识革命”等三层含义。苏维埃文化是以政治性和阶级性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它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突出表现。列宁首先是将苏维埃文化和“文化革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来看待并作出决策的。

【作者简介】张建华，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苏联早期“文化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项目编号：10JA770005）的阶段成果。

列宁在自己的理论思考中没有将意识形态认识为虚无或纯理性的东西，他将意识形态概念和理论的认识紧紧地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联系在一起。他在1894年完成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指出：“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①什么是“思想的社会关系”呢？即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②，具体到俄国现实，即是“真正的阶级意识”^③。列宁认为意识形态从属于阶级性和政治性，它应该主要体现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并且可以成为动员全体党员和无产阶级（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与一切敌对的阶级意识作斗争、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权乃至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和原则。在这里，阶级性、政治性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最突出的属性。因此，列宁强调工人阶级只有“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才能上升为“真正的阶级意识”^④。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政治口号即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⑤“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⑥他又强调：“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⑦

列宁强调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自发产生的，是需要“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进行“灌输式”宣传的。如何成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呢？他“需要成为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代表置身于火热的斗争并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们”^⑧，他们要“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要善于“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问题”^⑨。在这里，列宁已初步表达他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思想，即把知识分子分成“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反动的”知识分子，

并且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仅是工人、士兵、农民和少数革命家的革命，而是包括“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革命，而知识分子在革命宣传、发动和胜利过程中的作用完全不可替代。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已经开始考虑未来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建设了。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时期，列宁对“文化革命”的思考主要是从实施革命的手段和紧迫性方面出发，强调政治宣传和鼓动以及从揭露资产阶级政权的反动统治和资产阶级文化的虚伪入手。既然布尔什维克从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就必须以各种有效方式在工人、士兵和农民中间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鼓动，“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⑩。

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的主要关注点自然发生了变化。他发现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政治宣传中的形式主义和简单划一方式的弊端，他认为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社会主义建设，一切政治工作，包括“文化革命”都应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强调：“老式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谁要是宣传仍作旧的理解，那他就落后了，就不能担负起对工农群众的宣传工作。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正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⑪“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67页。

④ 同上

⑤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⑥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⑦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⑧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8页。

⑨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327页。

⑩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⑪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7页。

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①

列宁在 1923 年完成的《论合作制》(О кооперации) 中完整地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和理论。他认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②显然，列宁这里谈到的“‘文化’组织”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领域，是指与物质建设相对应的精神建设。因为，“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开发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③列宁把“文化革命”看成解决数个世纪以来俄国历史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的历史任务。“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④

列宁首先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在“文化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在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 的谈话中表示：“理所当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随便地听凭混乱发展。我们应该充分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过程并促使其成果的形成。”^⑤他在另一篇报告中强调：“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要重视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在讨论工作和组织建设的时候，绝不能忽视这一点。”^⑥

因此，在俄国，“文化革命”首先就是要“革”旧俄文化之“命”，因为“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⑦。“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个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⑧其次更是要“革”资产阶

级文化的“命”，因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⑨。在这里列宁明显地将“文化革命”上升到了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高度。

十月革命后，大多数的旧俄知识分子采取了与苏维埃政权不合作甚至是反对派的态度，他们利用新经济政策的宽松环境提供的各种讲坛，批评和责难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列宁认为此种倾向已经危害到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问题，因此必须严厉制止。列宁于 1922 年 3 月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发表了重要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О значении воинствующе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列宁在文章中强调：“我国那些喜欢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同他们在其他各国的伙伴们一样，很不喜欢用狄慈根所说的评价来考察问题。他们所以不喜欢这样做，是因为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马克思主义的杂志还必须对当代这类‘有教养’的农奴主作斗争，其中也许有不少甚至拿我们国家的钱，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担任教育青少年的职务，虽然他们不配做这种工作，正如人所共知的奸污幼女者不配担任儿童学校的学监一样。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⑩。

在反击“文化革命”中的反苏反共的右翼势力的同时，列宁也特别注意防备和压制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极左势力。轰轰烈烈的军

① 《列宁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93～394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3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3～774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6 页。

⑤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4 页。

⑥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03 页。

⑦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3 页。

⑧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5 页。

⑨ 《列宁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8 页。

⑩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4～655 页。

事共产主义戛然而止，新经济政策成为苏维埃政权扭转局势的法宝。然而，在党内极左势力看来，这完全是历史的倒退，是革命的失败。诗人格罗莫夫(П.П.Громов)写道：“革命来了，但不是所希望的，是粗野的，酒鬼的，革命不是由光明而来，而是来自黑暗，把铁的力量插入肋骨，将骨盆打得粉碎。”诗人库里岑(Курицын)写道：“酒鬼式的恶魔”，“东正教堂和天主教堂毁灭了”，“木质的未涂油漆的十字架，革命被钉在这里”。诗人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写道：“我们的红太阳破碎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大地上洒满了俄罗斯鲜血”^①。

列宁针对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以阿维尔巴赫为代表的“拉普派”的极左文艺路线，批评了他们的“把托尔斯泰、普希金丢到九霄云外”和建立“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的口号。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权威例证说明了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②

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1920年10月的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派和苏维埃工作》中，主张在政治领域中的党、经济领域中的工会、文化领域中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之间建立起相互平行的关系。列宁立即给予卢那察尔斯基严厉的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在理论上不正确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尝试臆造虚构自己的特别的文化，局限在自己的孤立的组织之内”^③。列宁亲自起草《论无产阶级文化》决议，对“梦想否定历史遗产、脱离党的领导、推行宗派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10月9日，俄共（布）中央通过上述决议，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发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看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④

列宁强调要重视和吸收人类文明提供的宝贵遗

产，而不管其原来的阶级属性，尤其是在像俄国这样文化落后的国家里。“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⑤况且文化成果是人类社会共有遗产，其本身体现了历史的继承性。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青年的学习、训练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这里的“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就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就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合乎规律的全部知识”。为什么要继承、吸收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列宁给出的理由是：“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它是在“吸收和创造了两千多年来的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产生的。况且，“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与中世纪制度和与小生产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⑥。

列宁认为，知识分子是政治革命的生力军，更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都是“经济上尚未独立的阶级”，必须从属和服务于某一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应该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区别仅仅在于它从事的是脑力而非体力劳动。因此，革命政党和革命领导人必须要真诚地对待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引导、在生活上关心、在业务上重视知识分子。列宁严厉批评了部分党员简单化地对待旧俄知识分子的态度，“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大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全部用起来”^⑦。他宣布：“我宁可拿出几十个人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的和内行的资产阶级专家。”^⑧

① Новлянский П. Вечер поэтов (об интеллигентских настроениях)// Красный мир. Москва, 03.04.1921 г.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③ Елкин А.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Москва, 1967. С.218.

④ 郑异凡编：《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⑤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178～179页。

⑦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⑧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列宁强调关心知识分子，“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①。由于列宁的极力主张，1919年12月23日《关于改善科学家的生活状况》法令颁布。1920年，列宁亲自过问无线电专家布鲁耶维奇主持的无线电传播实验，在得知因科研经费困难、实验面临夭折的消息后，列宁要求斯大林从黄金储备金中拨出10万卢布用于布鲁耶维奇的科学研究。1921年，列宁亲自过问并签署了《关于保证巴甫洛夫院士以及同他在一起工作人员从事工作条件的决定》，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院士与妻子的口粮、住宅和科研条件立即得到了解决。为此，在列宁的建议下，俄共（布）作出如下决议：“对于那些技术界、科学界、教育界、作家、诗人等代表中的真正非党分子，只要他们基本上已了解了实现伟大变革的真正意义，就必须给他们以经常的帮助并同他们进行认真的合作。”^②

全民识字是“文化革命”最具普遍意义的政策之一。列宁在1920年10月发表的《共青团的任务》中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③

列宁在《日记摘录》中有这样的记录：“1920年每一千男子中识字人数为409人，每一千妇女中识字人数为244人，平均每一千人口中识字人数为319人。”也就是说，1920年68%的人民处于不识字、文盲状况。而且识字并非代表有文化水平，并非表明胜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没有充分教会居民利用书报……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④。“你们完全了解，不识字的人是实现不了电气化的，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⑤

列宁的“文化革命”观是一个广泛的文化体系，是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既包括物质文明的内容，也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列宁对于在像俄国这样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困难性和长期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文化方面（因为我们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⑥。“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需经过整整一个时代”^⑦，而且居民参加合作社“不是消极

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需完成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是很少的一些工作”^⑧。

列宁认为，只有不断地利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改造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抵制资本主义及其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气，为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他指出：“我们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⑨，“从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只能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只有靠下一代人去担负”^⑩。因此，“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⑪。

二、布哈林的“文化革命”思想

在苏维埃政权早期领导人和苏共早期领袖中，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是对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最有发言权者之一。他在很长时间内负责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对于文化方面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文化革命”、文化建设和知识分子改造的论述。其代表作为《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我们以这3篇文章为基础研究的蓝本，分析布哈林的“文化革命”思想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态度和策略。

1923年2月5日，布哈林在彼得格勒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报告。他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具体思路：“我把这一文化领域分成了三个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9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774页。

⑦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⑧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页。

⑨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⑩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⑪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小问题，解决了这三个小问题，整个问题的答案就有了，——这种文化将产生什么新事物；其次，这一新文化传播得多远，它包括哪些人——用一个外国词来说，这是文化的粗放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这一阶级文化加工得有多深，或者这一加工的集约性。”就这一个问题，布哈林提出：“我们在这方面即在这一文化的、思想的领域，也像在纯粹经济和管理领域一样，将同样有一个计划经济。”^①布哈林的这一建议是他在文化领域对计划经济特点的灵活运用。他强调文化应当进行“加工”，无产阶级的文化应当变“粗放性”为“集约性”。因为“我们的文化原则是更高的……一切都取决于某种实际的考虑，即对于革命的进程，对于实现这些或那些任务是否合适”。简而言之，无产阶级的文化应当是一种有目的、有实现路径的“精品文化”。他又提出：“当这个阶级掌握了政权，深刻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统治时，由于它的文化程度很低，将不可避免地做出很多错事，显得十分笨拙，而且在一切领域里都会这样的。”^②这样，就强调了文化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布哈林认为，文化是可以用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只有掌握文化，支配文化，指出文化价值的方向，才能够不断地增加自身的力量。这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原则问题。

布哈林的这些思想都说明他对文化的高度关注。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民族和一个阶级拥有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不会受他人所控制。而一旦受到他人的控制，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基于这一点，布哈林又反复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的原则相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不妨称之为理论的优越性，然而在实践中，布哈林指出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优越性而言，即力量要弱小得多。那么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所存在的文化问题将是至关重要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他的回答是：教育。笔者认为，这一解决方法固然是正确的，然而却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方法。尽管无产阶级在文化原则上高于资产阶级，但是文化力量上是十分弱的。而布哈林指出：“通过使自己的成员接受教育，训练出一批干部，从而使工人阶级可以用自己的强劲手腕管理整个国家，可以把自己信赖的人作为有高度技能的人派到各个岗位上。”^③他的这种教育构想从方式上几乎接近于“精英化”教育，但是从教育内容上看所培养的多是管理国家的人才，却没

有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换言之，他的这种教育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的，然而对全民素质的提高却不起重要作用，那么最终无产阶级的力量将仍然无法真正强大起来。“在经济领域、群众工作领域……在整个文化领域，我们已经站在大规模的任务的大门口，我们已走出一个室内，走出文化的小书斋进入城市的大街广场，把文化的使者派往农村，派往穷乡僻壤。我们的科学开始越来越多地带动我们实践的飞轮转动……工人阶级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工作范围。”^④

1925年2月布哈林在中央委员讨论文学问题的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发言。在这次发言中，布哈林提出了同1923年《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决议截然不同的观点：不应该像“岗位派”那样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行取得文化和文学领域的领导权，而应当慎重地对待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作家，团结并改造他们。应该克服无产阶级作家队伍的缺点，争取在文学领域成熟起来，政府不应该干预文化和文学领域里的专门性事务，要让各种风格流派并存并“展开竞争”。

这与当时他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决议中所提出的应当在文化领域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教育”有很大出入。那么这两者是否矛盾呢？可以说，两者在表达方式上的区别是相当大的，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者所针对的是不同的方面。在文学讨论会议上，布哈林提出的“展开竞争”是针对文学这一领域（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专门提出的。

布哈林从小受父母的影响，4岁就开始识字，上小学时就能够背诵海涅的诗并且几乎读完了莫里哀的全部著作。他像欢迎“第一只燕子”一样渴望无产阶级的小说和戏剧作品的出现^⑤。而正如前文所说，布哈林关于取得教育领导权的主张主要体现在行政方面，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他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教育”，将之转化为“领导”，“领导”不等同于“垄断教育”。尽管布哈林对文学领域的主张带着浓厚的主观色彩，但是他的这一倡导对于俄国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版，第87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版，第90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版，第95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版，第253页。

⑤ [美]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关于文学领域的领导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布哈林也没有忽视，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同路人”问题；第二，由“同路人”引发的“自我教育问题”。所谓“同路人”，就是“岗位派”所指的非无产阶级作家。布哈林认为，“岗位派”所主张的对“同路人”的一部分进行同化，对另一部分驱逐的方法是错误的，对“同路人”问题，既不能自大狂妄，也不能丧失立场。他指出，党对文学领域的问题可以也应当进行宏观上的把握，“从总的方面可以决定一系列问题，党将在这方面做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在一系列艺术的形式问题上，在形式、风格的创造等问题上不能做这样的结论”^①。因为这会导致“创作过程的官僚主义化和损害整个艺术发展”。所以，布哈林实际上是倡导对文学领域进行内容上的领导，在形式上则可以宽松对待，这种适度的领导恰好可以达到无产阶级壮大文化力量的目的，虽然实际上对文学作品的思想进行管束才是真正的垄断，然而考虑到无产阶级刚刚夺取政权的情况，这样做又是必须的。不过，尽管如此，布哈林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提出了热切的希望，他说：“重复报纸上的文章”和喊几句“押韵的口号”“当然算不得什么艺术”。艺术应当反映“人类的全部感情——爱、幸福、害怕、苦恼、愤怒，等等——人类的全部期望和激情”。而这样一种艺术只能从“多样化和质量中产生”，从“在创造性地探求方面的广泛的竞争自由”中产生^②。

1936年4月，布哈林在巴黎左翼知识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我们正经历‘独立的个体’思想的危机，以普遍的军营思想来取代它；我们正经历着基督教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在传播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种族主义理论’、‘新偶像崇拜’、‘公开的兽行宣传’；我们也正经受着法律平等思想的危机，我们看到，正代之以永恒的等级制；我们正经历‘权利’危机，到处崇尚‘力量’、‘大威力’等等；我们还经历理性危机，‘唯意识论’、特殊形式的‘积极化’、‘弥赛亚说’、社会神话之类盛行。”^③

我们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布哈林关于文化方面的理论，不难得出结论，布哈林的文化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主要体现在其人文关怀上。如果说，众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将“历史唯物主义”放在比较突出的地位，主要强调物质

文明方面，那么布哈林的文化思想则对人本身精神层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提出意识产生于物质，这种类似对孰先孰后问题的阐述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意识比物质低级，相反，人们应当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使自身思想符合当今物质文明所处的高度。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都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分不开，因而应当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并同时提高二者。布哈林又指出，当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由于人们长期接受专制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对精神文明方面强调不多等诸多原因，人们目前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素质，人们应当追求独立个性和理性的光芒。

布哈林在这篇报告中指出，人类社会应当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这种理想状态的初步实现是“越来越多的不断增长的人民阶层充分参加文化生活的过程”。布哈林所提出的“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培养完整的人”可以说便是这种初步实现状态的极端化，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须步骤，是马克思主义中人文关怀部分的具体体现。

布哈林最后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并最终形成世界市场时，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相对统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消灭人类的不平等，最终实现“人类的再生”。布哈林关注人类本身，并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到了实现人类平等、实现人的自我回归的道路——社会主义，从人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但是对于他在文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把大量的人变成了‘零件制造者’，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使生产过程完全丧失人性，丧失任何‘创造的乐趣’，使开机器的活人依附于机器”的观点^④，在今天看来是需要重新认识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机器化生产正是将人从繁重的生产任务中解放出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时间，这些时间便可为人充分利用做那些自我喜爱的事情，享受许多“创造的乐趣”。这表明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拥有双重身份的布哈林在思考问题时的困惑，在较多的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1983年版，第350页。

② [美]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

③ 布哈林：《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9年第2期。

④ 同上。

场合里，布哈林是以政治家和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他的思想中自然也就存在“革命话语”了。

布哈林在1928年1月纪念列宁去世四周年大会上发表了《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的演讲。在这篇报告中，他一如既往地列宁的“文化革命”观进行了辩护，他认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仅拯救了旧社会留下的全部珍品，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比谁都快的速度……引来……波澜壮阔的巨流”^①。在这里，布哈林试图以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取得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成就来回答当年国内的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苏汉诺夫，国外的考茨基、葛兰西、罗莎·卢森堡等人对俄国这样经济落后而非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胚胎”的责难。

在报告中，布哈林还特别强调已经建成的无产阶级文化——苏维埃文化的根本特点，在于它的大众性和人民性。“在文化工作观点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放在首位的是群众。”“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的中心，我们文化工作的重心就在于此。”^②

布哈林在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列宁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他强调：“‘和平组织工作’、‘文化’工作等等不是什么和平的田园诗，而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③如果我们将布哈林此段论述放在当时的特殊的政治斗争背景之下，就可以理解布哈林一方面是以强调“阶级斗争”的方式阐述列宁“文化革命”思想，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为政治压力说一些合乎时宜的话罢了。

总之，布哈林的文化原则和文艺理论同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分歧，布哈林除坚持自己观点外，对自身见解的不足之处不时作出修正，因而我们可以在布哈林的报告中发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说明布哈林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他认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阶段。作为理论工作者要在思想和理论上不断修正思想，可见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用心良苦。

三、斯大林的“文化革命”思想与实践

列宁在晚年思想中特别强调：“从前我们是把

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④但斯大林却部分继而全部放弃了列宁的主张。伴随着越来越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乃至政治“大清洗”运动，伴随着加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伴随着党和国家权力逐渐向斯大林个人集中，斯大林已经将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放在政治斗争之上了。因此，从斯大林的公开报告和党内讲话中都很难看到对“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论述了。

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强调：“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这个转变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⑤

“大转变”不仅仅是农业方面的大转变，也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大转变，它实际上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标志着列宁主张的新经济政策被彻底放弃，苏联列车重回军事共产主义轨道。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不仅从重心位置跌落为配角地位，而且也自然重回极左的路线上来。

1928年5~6月，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召开的全苏鼓动宣传与文化建设会议上，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方针得到了充分的贯彻。这次会议针对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缓和的理论，强调在政治领域、经济部门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文化战线面临“资产阶级因素”的攻击。会议的决议中提出：“文化革命没有阶级斗争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必须向旧社会传统与习俗的残余以及资产阶级因素影响的死灰复燃开战。”^⑥

1929年5月，《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Естественная наука и Марксизм）杂志发表了题为《为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党性》的文章，文章指出：“理论领域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从来都不会失去阶级基础。当前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理论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6页。

⑥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也同样表现出敌视无产阶级的势力的抵抗。”文章揭发了经济学、文学、哲学等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流派，紧接着又把矛头指向自然科学领域，点了生物学、物理学和数学领域一批自然科学家的名字，然后做出结论：“显而易见，任何理论，尤其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都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和数学同经济学和历史学一样，都是有党性的。”^①

1930年1月，《红星报》（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主编柳京（А.В.Лютин）发表文章批评对农民实行的过激行为，认为它是偏离党的联共（布）十五大路线的。他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有18人参加的秘密反对派小组，并且草拟了长达200多页的意见书《18名布尔什维克的信》，在党内秘密流传。柳京的主张是放慢工业化的步伐，结束集体化并回到个体农业，恢复党内民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很快逮捕了柳京。1932年10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把柳京等18人开除出党并关押起来。

德波林学派^②是20年代中期形成的以德波林（А.М.Дебори）为首的哲学学派，其主要成员除德波林外，还有卡列夫（Н.А.Карев）、阿戈利（М.М.Аголь）、列文（М.Ливен）等人。哲学在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即是政治。从1924年开始，苏联哲学界发生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派是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为核心的德波林学派，强调哲学辩证法的意义；另一派被称为机械论派，以老一代革命理论家阿克雪里罗德、布哈林等人代表，该派强调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学）对于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们论战的主要依据都是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最终获得胜利的是德波林派，这次论战重申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同时也确立了德波林及其学派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

德波林1926年主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他们掌握了哲学领域的话语权，并且代表着哲学领域的正确路线，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全国“哲学界的领导”。1929年，德波林在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德波林派成了批判机械论的英雄。他们控制了国家出版局哲学部和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的哲

学组，机械论者季米里亚捷夫（Ф.Зимятев）领导的自然科学研究院也被改组，领导换成了德波林派的阿戈利。

在全国上下“大转变一年”的形势下，斯大林为理论界脱离政治斗争和路线而不满。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布：“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的成就，我们实际工作的成就与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斯大林讲话立即为一些极具政治敏感性的人从中嗅出了未来理论思想的指向。红色教授学院29岁的哲学教师米京（М.Б.Митин）与青年哲学家尤金（П.Ф.Юдин）撰写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批评声誉如日中天的德波林和德波林学派，指责他们以形式主义的唯心主义代替辩证法，指责他们标榜哲学的“独特性”，逃避现实性和党性。此文刊登在1930年6月7日《真理报》上，党的机关报编者特地在文后加注：“编辑部同意本文的基本论点。”应该说此阶段德波林学派和米京等人论战还仅仅限于学术领域，反映了新的哲学家对德波林学派霸主地位的不满。在最初阶段，米京等人虽然得到党报的公开支持，但争论仍然属于学术领域，并且德波林派还可以作出回应抗辩。如1930年7月，德波林派成员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5期上，联名发表题为《关于哲学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对米京等进行反批评。

然而，斯大林的讲话改变了这场学术论战的方向，并且开了一个先例，即党的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学术争鸣公开发表意见，并且明确支持一方。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代表时，强调要对资产阶级思想发起“进攻”和“批判”。斯大林为这次学术论战定了新的调子，即它是“意识形态斗争”，“使哲学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践，那算什么马克思主义”。学术领域的论战必须与党内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

^① <http://www.hrono.ru/biograf/deborin.html>

^② 德波林（1881～1963），苏联著名哲学家。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开始反对马赫主义。1907～1917年参加孟什维克派。1920年起担任编辑并从事哲学教学工作。1926～1930年担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责任编辑，1928年加入联共（布）。1929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院士。193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工作，曾历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科学院历史和哲学部主任，科学院主席团委员。20世纪20年代初在与机械论派的论战中形成德波林学派。

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了”。因此应该“进行战士般的意识形态斗争”，“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起来的粪便全部翻腾和挖掘出来。应当把德波林写的全部东西翻腾出来，摧毁一切错误的东西”。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还点名批评了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他甚至还点名批评了恩格斯，认为“恩格斯也不是全部正确的”。斯大林的谈话等于宣布德波林和德波林学派的死刑。随后，米京等人则攻击德波林派是伪装得“十分狡猾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它们企图采取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方式，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①。

随后，红色教授学院接连通过了关于哲学战线的决议：一是《哲学战线的状况》（1930年8月2日），二是《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问题》（1930年10月4日），三是《关于辩论的总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当前任务》（1931年1月26日发表）。在斯大林的支持之下，三项决议指名道姓地说：“在现代条件下，主要的危险仍然是机械论式的修正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佩罗夫、瓦利雅什、萨拉比扬诺夫、季米里亚捷夫、阿克雪里罗德等同志）和波格丹诺夫的机械论式的修正历史唯物主义（布哈林等）。”并明确把反机械论的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将其和对待斯大林模式的态度直接联系起来，即“这种修正基本上是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富农代理人的理论基础，因为这种修正在改造时期和全面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条件下具有国内深刻的社会根源。”1931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认为德波林站在“孟什维克或唯心主义立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忽视了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质的区别，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1月2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改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的决议，并将其成员从各个哲学机关领导岗位上调离，德波林学派解散。

斯大林亲自审查、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于1938年10月隆重出版，该书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斯大林亲自修改并定稿的。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其他版本的历史和党史教科书，凡是涉及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联共（布）党史的问题，一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唯一标准。在这部先后发行300多版、印数超过4300万册的书中，以伪造历史和篡改历史的方式抬高斯大林的个人影响和地位。这本书不仅是小学至大学各类学生的教科书，而且充当着全体党员政治学习的重要文件。

四、对“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理论思考

苏维埃国家是典型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为引导的国家，苏维埃文化是典型的政治文化，是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自上而下的制度层面和管理层面的意识形态安排，是苏联社会角色自下而上对苏联政治系统的认识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的总和。即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所说的“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②。

在国内学术著述中，“苏联政治文化”（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СССР/ USSR's Political Culture）与“苏维埃文化”（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Soviet Culture）概念常常被混用，其实两者间存在相当大的区别。“苏联的”（СССР/ USSR）通常指代的是国家概念；“苏维埃的”（Советский/ Soviet）通常指代包括强烈政治含义。因此，较为准确的理解是，“苏维埃文化”的概念无论就内涵还是外延都相对狭窄得多，专指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和合法地位的政治文化，而“苏联政治文化”泛指苏联境内各种政治文化，既包括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也包括居于非主流地位的其他类型的政治文化，如20世纪20年代被列宁斥为“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至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的文化”^③；又如20世纪70年代蔚为大观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及其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发的“回归文学”、“回归史学”、“回归哲学”

^① 《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② [德]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陈学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9页。

文化。

苏维埃文化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罗斯文化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再生；苏维埃文化是政治型的国家文化，而非历史型的民族文化。因为“苏维埃人”、“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政治概念，而非历史通用的民族概念；苏维埃文化是主观的动员型文化，非客观的进化型文化。它是苏维埃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和苏联人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响应与主动创造的双向作用而成的；苏维埃文化是大众型文化，而非精英型文化。因为此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广大的苏联人民，而非仅限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苏维埃文化是通俗型文化，而非经典（精致）型文化。苏联人民是此种文化真正的和最有发言权的体验者和享受者，因此苏维埃文化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

十月革命既是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更是一场任重道远的“文化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既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变革，更是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深刻革命。在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等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意识中，“文化革命”既包含对旧文化的“革命”内容，更包含新文化——苏维埃文化的“建设”过程，其核心是苏维埃政权在政治革命、军事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同时，必须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①理论，该理论并在他的政治学和思想武库中占据重要位置。葛兰西将文化在新国家和新制度初立时期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职能凸显出来，即统治者借助于文化手段影响并塑造大众的世界观，使其服从于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里的文化意味着什么呢？“它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②

比较而言，列宁在世的 1920 年代中期前正是“文化革命”顺利展开时期，其成就是巨大的。“耗散结构论告诉我们，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只有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才能克服混乱，维持稳定。因此，文化体制只有是开放性的，才能使文化发展达到最优化状态。苏联 20 年

代执行的正是这种体制，所以出现了‘黄金时代’。”^③在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一大批苏维埃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如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马雅可夫斯基（В.В.Маяковский）、左琴科（М.М.Зощенко）、法捷耶夫（А.А.Фадеев）、肖洛霍夫（М.А.Шолохов）、阿·托尔斯泰（А.Толстой）、富尔曼诺夫（Д.А.Фурманов）、绥拉菲莫维奇（А.Серафимович）和叶赛宁（С.А.Есенин）等。1922 年，农学家瓦维洛夫（Н.И.Вавилов）的作物种类演化论研究成果在国外发表，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物理学家弗里德曼（А.Фридман）1922 年在广义相对论方面提出非静态的宇宙模型理论，他的研究得到了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肯定。这一时期被苏联著名异议思想家和物理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Жорес Медведев）称为苏联文化的“黄金时代”^④。即便是《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的作者、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认为：“列宁主义时代（在列宁于 1924 年死后又持续了二三年），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试验。改革创新、破除迷信、开拓科学领域的新天地，在艺术界、建筑界、文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蔚然成风。”^⑤英国学者布罗夫金（Vladimir Brovkin）也肯定“整个 20 年代，即国内战争结束到斯大林获胜的 8 个年头里，是苏联时期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成就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还应该包括文化方面”^⑥。

斯大林执政的 30 年（1924～1953 年）是以浓重的个人印迹载入苏联历史的。斯大林无论是在受教育程度、知识见解和理论水平都无法与列宁和布哈林相比，在关于苏维埃文化和“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方面，斯大林也没有专论的篇章。斯大林关于“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论述大多是就某人或某事发表的谈话，而且极不系统。就是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长达 30 余万字的《联共（布）党史

① 英文为 Cultural Hegemony，又译文化霸权。

②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 页。

③ 姜长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6 页。

④ [苏]麦德维杰夫：《六十年来苏联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政策》，余明、杨德译，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15 页。

⑤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 页。

⑥ Vladimir Brovkin, Russia after Lenin: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21～1929.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P.1.

简明教程》中也只有不到百字谈到文化建设^①。

斯大林对国家发展战略乃至文化政策的考虑和决策出于他对国内和国外形势的错误判断。最高领导层内日趋激烈的路线斗争和个人权力的环境影响，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对斯大林个人威信发出挑战，国外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威胁日益迫近的形势影响，导致斯大林作出错误的判断，即：“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②“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③。

1928年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破获“沙赫特案件”，1930年破获“工业党”案件。斯大林在1929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宣布：“现在我们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还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这种暗害活动所以危险，尤其是因为它和国际资本有联系。资产阶级的暗害活动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分子还远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④

1934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苏联史学界展开了一场针对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的《俄国历史概要》的学术论战，攻击他的历史分期和历史观点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指责在波克罗夫斯基身边活跃着一个“史学界的暗杀集团”。于是，历史分期和学科体系在苏联变成了一个相当敏感的学术问题，成了一个令学者噤若寒蝉的“禁区”。

在沙赫特案件后，斯大林在各种讲话中都强调旧知识分子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成员，“所谓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律师、大学生和一般学生），是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有学识的人”，“我们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⑤。于是知识分子学术上的偏差和个性立即被看成是反党行为，在学术界开始了越来越猛烈的批判运动，在30年代的大清洗期间，上述犯有“学术”和“政治”错误的知识分子大多被以肉体消灭或关押的形式清除掉了。

在30年代弥漫的斯大林个人迷信、个人专权和大规模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斯大林个人垄断了理论创新权和文化解释权。这种领袖和苏共对文化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成为斯大林模式和苏联体制的重要内容，对苏维埃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犹如亲身经历了苏联历史上数次急风暴雨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И.Г.Эренбург）在其自传体著作《人·岁月·生活》（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中所言：“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Тому тяжело, кто помнит все）。”^⑥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即“由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和新学校的建设，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学校建设工作，小学和中学学生人数1914年为800万，而1936～1937年已增加到2800万。高等学校人数1914年为11.2万，而1936～1937年已增加到54.2万。这是一次文化革命。”参见：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5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16页，2～26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⑥ [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上卷，冯南江、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Soviet culture by the Red Leaders Lenin, Bukharin and Stalin.

ZHANG Jianhu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oviet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in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oviet political power, the red leaders: Lenin, Bukharin and Stalin, all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Soviet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ir thoughts differed and policies varied.

Key words: Lenin; Stalin; Bukharin; “Cultural Revolution”; Soviet culture; ideology